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一九八〇年代末期，蘇聯及東歐等共產國家因內部實施政治及經濟改革失敗，導致政權瓦解，當象徵「冷戰」(Cold War) 格局圖騰的「柏林圍牆」倒塌後，即引發「蘇東波」風潮的骨牌效應，導致蘇聯及其附庸的華沙公約集團國家加速崩潰，自此由美國及蘇聯兩大強權於第二次大戰後，所建構的「雅爾達體系」，¹ 逕宣告結束頓使國際體系進入「後冷戰時代」。² 國際關係間之權力運作，陷入混沌不明狀態，致使區域性具政治、軍事及經濟實力的國家相繼崛起，並亟欲加入國際政治權力核心，其中尤以亞太地區的中共最為積極且躍躍欲試。

一九九〇年代初期，英國、意大利及墨西哥等美歐地區，接連發生匯兌性金融危機；³ 先進發達國家之資金則相繼湧入亞太地區，促成區域內各國經貿活動蓬勃發展，藉此得以積極參與國際政治經濟活動；⁴ 惟在面對冷戰後的世界新地緣政治，全球經濟發展重心逐漸由大西洋地區轉向太平洋地區；⁵ 無疑有利於中國大陸的對內及對外的整體性發展。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期，亞洲國家幣值相繼貶值，日本卻因經濟泡沫化危機尚且自顧不暇，無法伸出援手；中共領導人江澤民、朱鎔基等即利用國內外各種公開場合宣示：「堅持人民幣匯率不貶」，中共官方更提撥四十億美元，以穩定東南亞國家貨幣幣值，此舉深獲世界銀行及歐美大國的一致好評。

中共相關領導人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後，不斷發表「中國」已是國際社會大國的言論，例如中共人民銀行前行長戴相龍謂：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是一個「大國」的道德；前總理朱鎔基更在一九九八年四月初訪問法國期間，向法國總統席

¹ 雅爾達體系：1940 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英國及蘇聯於雅爾達協商並制訂密約，建構大戰後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並確定國際關係的兩極體制，進而形成的國際體系。

² 「後冷戰時代」的時機與定義，學者有「肯定論」及「否定論」兩種不同的看法，美國哈佛大學奈伊教授 (Joseph S. Nye, Jr.) 代表前者主張美蘇二極體系已瓦解，另杭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稱俄羅斯取代蘇聯，在追求國家利益下，東西對抗危機尚未解除。本文以肯定論觀點為基準。

³ <金融大亨索羅斯與國際金融>，國際瞭望第 637 集，
<http://www.cts.com.tw/ctse/program/program-1/870216.htm>。

⁴ <江澤民 1998 年 8 月接見使節會議代表時發表重要談話>，轉引自《國際形勢與中國外交學習讀本》(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年第 1 版)，頁 146-147。

⁵ 王逸舟著，《國際政治析論》(台北：五南圖書公司，民國 86 年初版)，頁 345-349。

哈克表示，中共對東南亞國家的經濟援助比「歐盟」任一國家都要為多。⁶ 藉以凸顯「中共」已是國際體系中的「大國」，對國際社會負有責任且責無旁貸。

中共自「十二大」以來，對外即秉持在「和平與發展」的國際格局認知原則下，遂行「獨立自主」政策，而國家整體對外戰略則以「安全」為核心佈局；尤其是與「大國」之間的和平相處與外交關係往來，更是經濟穩定與國家發展的基石，面對當前的國際局勢，特於「十五大」提出「大國關係深刻調整」論調，至於廣為學者及媒體報導的「大國外交」，雖未見中共官方明確宣示為中共外交整體政策之一。⁷ 但中共「十五大」期間卻不斷與主要大國往來，尤其是透過經貿往來建立各種關係，及至「十六大」的政治報告，更是主張與發達國家的相互交往，作為對外關係中的首要之務。

後冷戰時代來臨時，中共第二代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即不斷向黨內重要幹部指出，「中國」已是國際格局中的重要大國，爾後對內只要穩定發展就大有希望，在對外策略上應將「國家主權及國家安全」，始終視為國家生存的首要之務；另針對國際局勢變化要「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面對國際體系朝多極化發展，國際地位與俄羅斯一般，是為國際社會的大國且為其中一極；今後的對外政策重點為「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及建立國際政治和經濟新秩序」；至於外交方針應以「和平發展」為主軸，並要「有所作為」，如此「中國」的綜合國力才能名列世界前茅。⁸

冷戰結束後，國際格局雖然改變，但是國際安全環境仍是暗潮洶湧，中共為確保國家生存之安全及利益，即在冷戰末期先與近鄰俄羅斯，恢復因敵對而交惡多年的外交關係，後冷戰期間，不僅重視睦鄰週邊外交，與週邊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夥伴關係，更在國際權力政治核心的國家利益前提下，以「遠交近親」、新安全觀為著眼，紛與國際社會中的區域及世界之主要國家，建立各種夥伴關係。中共與英、德、法、日等大國建立夥伴關係，則是秉持國家利益，再透過相互依存，建立雙邊或多邊的國際合作關係；另與其他相關國家的夥伴關係，則是以經濟利益及週邊安全為考量。自一九九三年起，與巴西協商建立夥伴關係，迄今共

⁶ 岳健勇、陳漫，〈論人民幣匯率政策調整的可行性〉，《戰略與管理》（北京：中國戰略與管理協會，1999年第1期），頁11；朱維瑜主編，《1999年年鑑》（台北：中央社，民國87年初版），頁839-840。

⁷ 〈跨世紀中共大國外交的回顧與展望〉，《2001年中共年報下冊》（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民國90年初版），頁6-15。

⁸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頁315-321、347-349、353、363-365。

計達廿二個國家。詳如附表（表：1-1）。

表 1-1：中共與各國建立的夥伴關係表

夥伴國家	夥伴關係名稱	簽署年份
巴西	長期穩定、互利的戰略夥伴關係	1993 年
尼泊爾	世代友好的睦鄰夥伴關係	1996 年
美國	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	1997 年
加拿大	全面合作夥伴關係	1997 年
東盟	睦鄰互信夥伴關係作	1997 年
日本	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	1998 年
埃及	戰略合作關係	1999 年
南非	夥伴關係（比勒陀利亞宣言）	2000 年
土耳其	更加密切夥伴關係	2000 年
俄羅斯	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睦鄰友好合作條約）	2001 年
歐盟	全面夥伴關係	2001 年
委內瑞拉	共同發展的戰略夥伴關係	2001 年
韓國	全面合作夥伴關係	2003 年
蒙古	睦鄰互信夥伴關係	2003 年
墨西哥	合作夥伴關係	2003 年
巴基斯坦	全面合作夥伴關係	2003 年
印度	長期建設性合作夥伴關係	2004 年
德國	具有全球責任的夥伴關係	2004 年
義大利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2004 年
匈牙利	友好合作夥伴關係	2004 年
法國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2004 年

英國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2004 年
----	----------	--------

資料來源：

(一) 中國外交部網頁，<http://www.fmprc.gov.cn/chn/wjb/zwjg/default.htm>。

(二) 新華網，http://news3.xinhuanet.com/world/2004-05/04/content_1452529.htm。

http://news3.xinhuanet.com/world/2004-05/09/content_1457479.htm。

(三)《中國外交 2004 年版》，(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 年版)

依據中共與世界各國正式建交的外交關係，可察知一般性多為友好、合作關係，其後再於國家利益、國家安全的驅動下，逐步發展為建設性友好、合作性、睦鄰互信、全面性等，甚至是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經由上述建立的各種不同層次夥伴關係可發現：中、俄建立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對冷戰後的國際格局走向，最具關鍵性的影響；中、美之間的夥伴關係轉折，呈現出國際關係的霸權與崛起國家的權力政治之爭；至於有關中共與重要大國建立的夥伴關係，詳如附表（表：1-2）。

表 1-2：中共與主要大國建構的夥伴關係表

夥伴國家	建 構 夥 伴 關 係		
美 國	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1997 年）		
俄羅斯	睦鄰友好、互利合作的建設性夥伴關係（1994 年）	平等信任、面向 21 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1996 年）	
歐 盟	面向 21 世紀的長期穩定的建設性夥伴關係（1998 年）	發展長期穩定的建設性夥伴關係（1999 年）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2004 年）
英 國	全面夥伴關係（1998 年）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2004 年）
法 國	建立面向 21 世紀的全面夥伴關係（1997 年）	全面夥伴關係（2002 年）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2004 年）
德 國	具有全球責任的夥伴關係（2004 年）		
日 本	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1998 年）		

資料來源：

(一) 中國外交部網頁，<http://www.fmprc.gov.cn/chn/wjb/zwjg/default.htm>。

(二) 新華網，http://news3.xinhuanet.com/world/2004-05/04/content_1452529.htm。
http://news3.xinhuanet.com/world/2004-05/09/content_1457479.htm。

(三) 《中國外交 2004 年版》，(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 年版)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國際政治學者摩根索 (Hans J. Morgenthau) 認為「國際政治」係指國與國相互間的對權力追逐與角力之關係；郝思悌 (K. J. Holsti) 則認為是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之間互動過程；⁹ 國際政治運作，係因各國基於國家利益及國與國相互之間，相互較量權力，再經外交策略謀定、外交手段遂行，並依附在國家戰略指導之下，以全軍之勢保障國家利益及維護國家安全。鑒於中共的外交與內政之政策，可謂為一體的兩面，惟今中共在「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國策下，仍未放棄「四個堅持」，企圖以統戰策略改造資本主義社會。¹⁰

中共外交部前部長唐家璇認為，中共外交政策嬗遞可區分為以下的五個時期：一面倒、反蘇反美、聯美反蘇、獨立自主和平外交及大國外交等五個時期。¹¹ 「十六大」期間則更進一步表示：中共「十四大」的外交成就，即在進一步鞏固週邊睦鄰友好關係；「十五大」的外交成就，則是在國際上確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國的地位，尤其在亞洲金融危機、印巴核試危機、科索沃危機等國際危機期間，更是發揮負責任大國的作用，確立「中國」全方位外交新格局、構築大國關係框架。¹² 中共官方刊物亦指出，世界正朝多極格局發展，國際形勢朝「總體和平、局部戰爭，總體穩定、局部動盪」的方向發展；「大國」之間的深層矛盾依然存在，彼此間是既合作又鬥爭又相互制衡的關係；故「中國」將藉由主張和行動之作爲，以體現作爲和平、公正、負責任大國的形象。¹³

「十五大」期間，是中共在對外關係上的重要轉折期，完全以實事求是的具體外交方針運作，藉舉辦與參與世界婦女大會、世博會、亞歐會議、亞非會議、

⁹ 李登科等，《國際政治》(台北：國立空中大學，民國 85 年 8 月初版)，頁 5。

¹⁰ 尹慶耀，《中共的統戰外交》(台北：幼獅文化圖書公司，民國 74 年三版)，頁 3-4。

¹¹ <五十年來中共外交政策的演變>，《2000 年中共年報》(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2000 年 6 月)，頁 101-117。

¹² 唐家璇，<國際地位空前提高>，《瞭望新聞週刊》第 44 期(北京，2002 年 11 月 4 日)，頁 37。

¹³ 中國外交(2001、2002 年版節選)，中共外交部網站，<http://www.fmprc.gov.cn>。

財富全球論壇及亞太經合會（APEC）等國際性大型會議，或是籌辦奧運及亞運等大型國際性運動活動，塑造在國際中的「大國」形象及地位。然在傳統的安全觀下，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仍繫於各主要大國之間的政治、軍事及經濟等關係；另「中共」在以國家利益為要旨的外交進退攻防策略，基於相互依存的牽動，已關係到亞太、歐亞乃至及全球性的安全。¹⁴

國家生存是中共遂行國家安全的核心，是以在二〇〇四年的國防預算中，帳面名目即高達二二三億美元，但根據各國的評估，真正預算應高達六五〇億美元，近年以來平均每年增長 15%，更是不斷向俄羅斯及西方國家軍購各種高科技精密武器及裝備；因此，日本防衛大學學者村井友秀直指，中國對日本邁向政治大國無疑是個威脅，歐美及亞洲國家輿情，基於「崛起—強大—爭霸—威脅」的論點，逕相報導惟恐「黃禍」再起之「中國威脅論」。¹⁵

大陸學界研究指出，後冷戰時期的大國與夥伴關係，是國際政治之結構基礎及發展趨勢。¹⁶ 中共雖積極發展「大國外交」以營造和平共處的國際環境，但在軍事層面上，卻採取積極性的防禦攻勢措施，觸發成「中國威脅」的聯想；筆者針對媒體相關報導發現：中共對流氓國家輸出核武飛彈技術；¹⁷ 以美國為首要軍事目標；¹⁸ 對亞太及週邊國家部署飛彈；¹⁹ 軍援巴基斯坦製造南亞緊張局勢；²⁰ 對台文攻武嚇及積極部署飛彈製造東亞危機等。²¹ 「九一一事件」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針對恐怖主義活動，通過第一三六八號及第一三七三號決議文並指出，「單獨或集體固有的自衛權利」，以維世界和平；鑒於此論已涉及到國與國之間的「平等主權」及「絕對主權」問題。²² 惟恐對台海安全及領土主權的問題解決造成衝擊。

基此，筆者將針對中共在「和平與發展」的國家策略下，以國家利益作為對

¹⁴唐世平、曹筱陽，〈尋求中美日相互安全的基點〉，《戰略與管理》（北京：中國戰略與管理協會，2002年1月第1期），頁99。

¹⁵孫恪勤、崔洪建主編，《遏制中國：神話與現實》（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1996年第1版），頁4-9、456、457；楊開煌、魏艾著，《中國大陸問題研究》（台北：國立空中大學，民國88年初版二刷），頁341-342。

¹⁶〈中共推動夥伴外交防止台獨〉，《聯合報》，民國87年11月20日13版。

¹⁷〈印巴核武危機中共幕後黑手〉，《中央日報》，民國91年1月8日7版。

¹⁸〈中共首要軍事目標由台轉美〉，《中央日報》，民國91年1月12日7版。

¹⁹〈中共積極部署長短程飛彈威脅台美〉，《中國時報》，民國91年1月11日11版。

²⁰〈中共提供武器給巴基斯坦〉，《中國時報》，民國91年1月9日11版。

²¹〈中共文攻武嚇暨兩岸關係發展〉，《1997年中共年報》，（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97年初版），頁2-1~2-12。

²²劉宗坤，〈自衛權與主權—軍事打擊恐怖主義活動的法理基礎〉，《戰略與管理》，（北京：中國戰略與管理協會，2002年第1期），頁47-51。

外關係的原則下，探討中共在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下，國家領導人對國際政治的體認，構築「大國外交」方針；再如何藉此方針，基於政治或經濟或軍事或安全等議題，與國際社會中的美、英、法、德、日、俄等主要大國，建構各種「夥伴關係」；進而論述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

第三節 研究理論

社會科學研究中，「理論」可透過不同的性質描述予以定義，通常採行「過程取向定義」與「畫界定義」兩種方式；在「過程取向定義」中，旨在探詢各種穩定關係的指導原則，意謂「理論」可以對各種孤立現象、問題，進行觀察且提供一般性的解釋或驗證。在「畫界定義」中，係將「理論」與其他陳述之間進行劃分，再藉由「可證偽」的假設和驗證，否定「理論」後再行精進。²³ 學者華爾茲（Kenneth N. Waltz）指出，「理論」既是概念亦是假設，意在說明及解釋「法則」，再者「理論」雖非事實但可以反映和解析現實，進而反映事實之間的關聯性，並建構彼此間的依存關係。²⁴ 辛格（J. David Singer）及立柏（Robert Lieber）指出，「理論」尚有描述、解釋及預測功能。²⁵ 恩格斯認為在不同的時代歷史背景下，「理論」具有不同的思維及呈現方式，但在實際應用上，思維採用經驗法則亦是非常重要。²⁶

國際體系的變遷與體制的異動，通常係由大國之間的互動關係所引起，尤其是在後冷戰時期，主要大國間在對外行使與支配權力時，不僅要兼顧國際社會體制的相互依存，在面對各自的國家利益時，又要避免因利益運作而產生糾葛之顧慮，進而破壞現存的國際體系；基此，本文將針對國際政治的相關理論，採用「過程取向定義」方法研究進行探述，再依據國際社會之現實環境及發生事件所產生的現象，經由歸納後加以整理，俾予進一步探討。

一、傳統現實主義—權力平衡理論

²³任曉等譯，Larsen, S. U 主編，《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Theory and methods in the sciences）（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版），頁7-10。

²⁴胡祖慶譯，Kenneth N. Waltz 著，《國際政治體系理論解析》（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台北：五南圖書公司，1997年1月），頁2-18。

²⁵倪世雄，《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版），頁4。

²⁶恩格斯，〈自然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頁382。

現實主義承繼馬基雅佛利《君王論》、霍布斯《巨靈論》及洛克《政府論》等傳統政治理論之重要論述思想，強調國際關係受到人性與「自然狀態」法則的支配及影響，並主張四項基本論點：

第一：人因私慾及求生意志，在政治上呈現「權力的意志」，擴及國際關係即為「國家權力擴張」現象。

第二：國際社會處在無政府（anarchy）狀態下，國際政治即是「權力之爭」。

第三：國家在維護利益考量下，衝突與鬥爭是國際關係的最基本特徵，惟在國際上享有的權力愈大，則所獲利益愈大。

第四：權力與利益是對外政策的核心，決策時並可超越道德及理想。²⁷

卡爾（Edward Hallet Carr）強調「現實主義」的基本原則在於「權力是政治的核心，道義是權力的產物」；摩根索指出，「國際政治」無非是各國基於國家利益而進行的權力角逐，並引述美國政治家蘭道夫（John Randolph, 1773-1833）說法：「惟權力才能限制權力之說」，遂倡議「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其已意謂在尋求特定國際情況的外交政策、實際的國際現況、大致平衡的權力分配、任何型態的權力分配；另謂「權力平衡」有四種意義：追求特定國際情況的外交政策；實際存在的國際情況；大致相等平衡的權力分配；任何情況下的權力分配。²⁸「權力平衡」在西方的國際政治史上，曾經實踐且為維持國際秩序與和平的方法之一；史派克曼（Nicholas J. Spykman）主張在「權力平衡」的架構下，國家在有限的目標下，不是代表強權就是依賴者，至於外交政策在維持國家生存及改善國家的權力地位。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認為當有能力改變現狀的大國，普遍認同接受現行國際體系的正當性時，如此外交才得以發揮作用，才得以建構穩定乃至和平的國際體系，惟若有少數不滿現狀者，必將導致國際體系的動盪與不安。法國學者艾隆（Raymond Aron）強調不論何種國際體系，權力平衡不但是自然趨勢亦是重要的原則。²⁹

學者克勞德（Inis L. Claude, Jr.）指稱，國際政治中的「權力」是種模糊的概念，依據不同狀況下有情勢、政策及制度的意涵解釋，當在處理國際政治問題時，

²⁷同註 25，頁 15、32。

²⁸張自學譯，《國際政治學》（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4th edition, 1966）（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國 77 年第 3 版），頁 37、237-241。

²⁹胡祖慶譯，Robert L. Pfalzgraff Jr. & James E. Dougherty 著，《國際關係導讀》（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台北：五南圖書公司，民國 82 年初版），頁 59-77。

應在制度結構下以「均化原則」(principle of equilibration)作為行動準則，透過各種國際問題處理的機會，不斷探求及釐清「權力」的本質，確以掌握「均勢」，而最終目的在防止戰爭並維持和平。³⁰ 鑒於冷戰後的國際體系呈現「一超多強」格局，但因綜合國力的懸殊，造成「一超」與「多強」國家之間的關係，出現對立性的根本變化；基此，中共基於權力平衡考量，不斷透過外交作為，營造以區域性的核心且是世界負責任的大國，以凸顯大國的國際地位，另企建構國際新秩序，型塑多極化國際體系格局，成為主導國際體制運作的大國。

二、結構現實主義—國際體系理論

「體系」係指若干有關事物互相聯繫、制約之後，而構成的一種整體性的「系統」；³¹ 依據自然科學中的「系統論」指出，研究方法的特點在整體性，研究目的是「尋求在系統與子系統間內部整體的模式、原則和規律」；³² 伊斯頓(David Easton)倡議「政治系統論」，主張政治系統是構成人類社會系統的重要部分。³³ 爾後國際政治學者基於國際政治的詭譎多變，遂在「系統論」的架構下，專研以國家為主要構成體的「國際政治體系」，並在此大系統中涵蓋有各種不同層次的子系統，彼此相互作用且關係密不可分，惟各行為體間不僅相互制約、滲透及依存，形成既對立又統一的有機體制。³⁴

新現實主義學者華爾滋強調，國際體系理論區分為兩大類，分為「簡約理論」和「系統理論」，前者係藉由討論國家或次國家層次的系統成員行為，再以解釋國際政治現象；後者亦稱為「體系理論」，旨在解釋系統之間重複發生的變化現象，而非系統之內各種現象的變化。³⁵ 科學行為主義學者卡普蘭(Morton A. Kaplan)在《*The System and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國際政治的系統和過程)專著中，藉由基本行為準則、轉化規則、角色分類變數、能力變數、信息變數，推衍出「國際體系六模型」，並區分為權力平衡系統(balance of power)、鬆弛兩極系統(loose bipolar)、緊密兩極系統(tight bipolar)、全球系統(universal

³⁰張保民譯，Inis L. Claude, Jr.著，《權力與國際關係》(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台北：幼獅文化圖書公司，民國75年10月再版)。

³¹《辭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年版)，頁596。

³²同註25，頁328。

³³羅浩，《國際政治與國際組織》(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民國88年版)，頁29。

³⁴梁守德、洪銀嫻，《國際政治理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頁104-106。

³⁵同註24，頁80-92。

)、階層政治系統 (hierarchical)、單位否定系統 (unit veto)。³⁶

新自由主義學者基歐漢 (Robert O. Keohane) 指出，國家之國力強弱優劣將影響到該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高低，另國際機構雖非可以長期箝制某個國家，卻可在相當程度上影響或左右該國的行動力。值此，若國際體系無重大變化，國力的增減對國家在國際社會地位的升降無必然性的影響；例如冷戰期間，日本根本無法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但後冷戰時期，在美國的力促下則已初見端倪。³⁷ 美國國際政治學者杭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認為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國際體系已朝向「單極為主的多極體系」(uni-multipolar international system) 發展。惟原本兩極體系下僅存的強權，在處理國際衝突事件時，或與盟國採取協商及合作方式，進行危機處理；亦或是以超強姿態直接介入國際體系內成員國家的內政或外交政策；甚至在「合作的權力」³⁸ (the co-operative power) 運作下，遂行強權意志。

奧森 (Mancur Olson) 及柴克豪賽 (Richard Zeckhauser) 指稱，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 成員國在分攤國防經費即「公共財」時，大國為顧及國家安全願意多負擔較多的費用，相對其他小國不僅分攤較少且得以共同享受組織同等值的「公共財」；嗣後康德柏格 (Charles Kindleberger)、費瑞 (Bruno S. Frey) 以國際合作理論之「公共財」及「搭便車」(free riding) 觀點，探討國際政治經濟，後者更結合「公共選擇」(public choice) 論點，在探討國家在採取政策或行動之前，將據此進行「理性抉擇」，以獲取相對利益。另對「搭便車」者，亦可將「公共財」轉化為「私有財」，兩者成為對價的交換關係 (*quid pro quo*)。³⁹

國際體系之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模式，詳如附表 (表：1-2)。

表 1-3：國際體系兩模式表

項 目	新 現 實 主 義	新 自 由 主 義
主 要 問 題	戰爭根源、和平條件	社會、經濟、環境問題
當前國際體系概念	無政府狀態	全球社會、複合相互依存
主 要 角 色	民 族 國 家	國家及非國家角色

³⁶羅浩，《國際政治與國際組織》(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民國 88 年版)，頁 30-31。

³⁷陳一新，《斷交後的中美關係》(台北：五南圖書公司，民國 84 年第 2 版)，頁 25-27。

³⁸奈伊 (Joseph S. Nye) 主張，一個國家推動某種情況，促使其他國家仿效採取一致行動的能力。

³⁹陳一新，《戰略模糊中的美中臺新圖像》(台北：遠景基金會，民國 93 年版)，頁 17-19。

主要動機	國家利益、安全的權力	人類的需求
體制變革可能性	低	高
理論、觀點來源和手段	政治學、歷史學、經濟學	社會、自然及技術科學等

資料來源：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頁131。

當代國際社會認為，中共經濟發展提升綜合國力後，已成為國際體系中新興崛起的大國，中共面對國際體系外部制約而無法獲取最大國家利益，遂營造和平共處及合作共存，期在國際環境中創造公共利益，經轉化為外交政策上可運用之私有財，進而以獲得國家之相對利益。

三、相互依存理論

「相互依存」論點係由庫柏（Cooper Richard）在一九六八年發表《相互依存經濟學：大西洋社會的經濟政策》（*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 Economic Policy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中首先指出，一九六〇年代國家經濟發展與國際經濟發展之間具有敏感的互動關係；一九八〇年代再加入國際安全與國際制度的討論，致使「相互依存」有新型態的發展。學者郝思悌視「相互依存」為國際體系的根本特徵。⁴⁰ 依據利柏研究歸納發現「相互依存」有四種不同觀點：全球主義或制度主義學派；⁴¹ 修正學派；⁴² 結構現實主義；⁴³ 新馬克思主義的依附論；⁴⁴ 其中以「修正學派」為主流，本文即以此為架構進行引證。⁴⁵

新自由主義學者基歐漢與奈伊二人，在一九七七年撰述《權力與相互依存》時強調，發展國家與跨國間的關係、重視超越國界的相互聯繫及結盟等關係，並指出「相互依存」理論是摒棄國家為國際社會唯一行為者的觀念，尤其是國際社會中不同角色之間，因受到外部的敏感性與脆弱性的影響，而產生對稱或不對稱的制約關係。復結合現實主義的權力政治與行為主義的論點，提出「複合相互依

⁴⁰同註 25，頁 335-336。

⁴¹主張國際關係不再是權力政治的舞台，將逐漸由經濟、社會、文化等議題所佔據；更甚者指出以國家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即將瓦解。

⁴²調和傳統現實主義和全球主義的折衷方法。

⁴³國際社會存在無政府狀態，由於「安全困境」致使國際關係之間無法衍生相互依存。

⁴⁴國際關係中不存在對等的相互依存，在資本主義的擴張下，即產生中心一邊緣體系的依賴。

⁴⁵同註 25，頁 339。

存」(complex interdependence) 的基本概念為：多渠道的國際社會聯繫網絡，國家之間強化相互依存和聯繫的關係；國際問題多元化，軍事安全已非國家之間的議事主軸；軍事力量的彰顯及作用日益減弱。一九八七年上述學者復依據國際關係變化重新撰述《重評權力與相互依存》，並針對《權力與相互依存》論點進行修正，尤根據國際社會現況提出新的基本原則：堅持權力政治的分析方法；核心理念為「複合相互依存」；強化國際機制的變化與研究。「相互依存」與合作並無必然性的關係，尤在國際體系及國家內部的影響下，仍不排除發生衝突的可能性。西方部分學者針對「相互依存」理論會帶與世界「和平及合作」之說。權力政治與相互依存理論比較，詳如附表（表：1-3）。

表：1-4：權力政治與相互依存理論比較表

	權 力 政 治	相 互 依 存
問 題	安全及權力平衡	人口、糧食、環境及能源
行爲者	國家（第一及第二世界）	國家（第一及第三世界）、跨國公司
國家關係	國家利益	相互依存、共同利益及國際合作
法 則	衝突（零和）：權力平衡	合作（雙贏）：建立共同體
管 理	雙 邊	多 邊
權力作用	強 制	報 償
武力作用	高	低
組織方式	等級制（兩極或多極）	近乎平等主義
前 景	基本不變	根本變化

資料來源：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頁338。

冷戰後國際格局及架構的改變，促使傳統「安全觀」朝多元化發展，並影響權力政治之結構與佈局，中共則主張「和平與發展」的共存共榮關係；基此，冷戰後各國以經濟利益，作為國際合作及相互依存之基礎，是以中共採取參與者的角色，積極融入國際社會，以「和平崛起」及「新安全觀」之主張，發展大國外交政策外，更是積極建構各種相對利益的夥伴關係，化解「中國威脅論」。

第四節 文獻回顧

鑒往知來是為本論文撰述及探討的要旨及重要依據，是以循經文獻回顧方式，俾予瞭解相關學者對中共如何開展大國外交，如何建構夥伴關係等相關問題，以及兩者之間的關連性研究；惟因本文係以中共外交為主軸，為求多瞭解中共官方及大陸學者的觀點，筆者主以中共官方、大陸地區出版的各種文獻期刊、專書等，盡其所能的蒐集後予以整理，計有大陸期刊廿三篇、專書十本；再輔以台灣地區發行台灣期刊十二篇，專書八本，經由研整分析後，歸納為撰述本論文的探討方向，有關文獻探討方面分別陳述如下。

一、國家利益定義的演繹與變遷

西方國家對於「國家利益」概念，肇始於希臘史學家修西底斯（Thucydides）在《伯羅奔尼撒戰史》（*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撰述，「自保」是政治領袖的主控國內外政治行動的首要利益，各國基於自身利益考量，以致衝突在所難免。⁴⁶ 近代現實主義學者卡爾在《二十年的危機》（*The Twenty Years' Crisis*）：1919—1939》中引證，十九世紀時英國在國際經濟市場上，不論在資本及技術上皆較其他各國具有絕對性的優勢，但仍在英國的國家利益考量下，倡議「不同的國家有不同國家利益」之「經濟自由競爭」政策。⁴⁷ 摩根索在《國家間的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的現實主義「六原則」中強調，「利益」不僅是「權力」的核心概念，更是理性判斷和主導政治行為的標準，故一國的外交政策須以「國家利益」為基準，透過國際政治的積極運作，以不斷追求權力價值。⁴⁸ 復在《美國的國家利益》中定義，「國家利益」涵蓋層面包括領土完整、國家主權及文化完整；⁴⁹ 另有學者指出，外交政策的最高準則即是國家利益；⁵⁰ 或謂：「國家利益」在邏輯思考下，具有相對永恆存在的必然性；惟在環境的客觀條件上，而有所變化。所謂相對永恆利益係指國家利益的核心（hardcore），即指國

⁴⁶同註 9，頁 71-72；同註 25，頁 251。

⁴⁷同註 25，頁 53。

⁴⁸同註 25，頁 66-72、252。

⁴⁹Hans J. Morganthau，〈*The National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p46, 1988；轉引自註 25，頁 252。

⁵⁰同註 25，頁 258-259。

家政治實體的生存條件的完整性，包括層面有國家領土、政治制度、文化等。⁵¹

羅瑟特（Bruce Russett）、史塔（Harvey Starr）對現實主義所倡導的「國家利益」，尤將國家視為單一決策個體並不認同，反指出若不跳脫上述思考的窠臼，尤其是忽略國內不同團體的利益時，即無法分辨出國家確切的整體利益為何，乃至無法掌握國家在國際體系中，所追求的政治目標、價值及優先順位。皮爾森（Frederic S. Pearson）及羅徹斯特（J. Martin Rochester）指稱，「國家利益」並非以意識型態或道德為準則，而係以保護人民生命及維護領土完整；促進國民經濟福祉；維護民族自決。值此「國家利益」即非由政治精英以自身的利害關係所可決定。⁵²

大陸學者洪兵主張，在多極化的世界格局環境下，「中國」面對國際關係及凸顯國家地位時，「國家利益」的順序為領土、安全、主權、發展、穩定、尊嚴，並呈現出多元化的外在大特性；⁵³唐永聖、劉靜波、張志忠等則認為，面對「國家利益」應體認物質基礎、外部環境的不可選擇性等客觀事實存在，可藉由經濟環境變化、相互依存發展，運用國際政治的矛盾性，成為影響「國家利益」的結構和實現手段。⁵⁴顧德欣、黃琦、黃碩鳳、丁永康等皆主張國際體系內的國家，可透過綜合國力以展現國家實力，藉展現各種影響力，以謀求國家的永久及根本利益。⁵⁵

張文木指出，國家利益不僅影響政策面執行的整體觀念，更是主導政策實現之手段。⁵⁶楚樹龍認為，「和平與發展」是「中國」的國家核心利益，首要策略在於發展、外交及安全，尤當國家主權及領土完整遭到威脅時，應不惜使用武力遏制。⁵⁷王逸舟表示，後冷戰時代面臨全球化的挑戰，國家與國際體系聯動關

⁵¹Hans J. Morgenthau, *Dilemmas of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p.66-69; 轉引自丁永康,〈九〇年代澳洲基廷政府與霍華德政府對國家利益觀點之比較分析〉,《問題與研究》(台北:政大國際關係中心,民國87年7月第37卷第7期),頁69。

⁵²同註9,頁76、79-80。

⁵³洪兵,《國家利益論》(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

⁵⁴唐永聖、劉靜波、張志忠,〈國家利益的分析與實現〉,《戰略與管理》(北京:中國戰略與管理協會,1996年),頁70-80。

⁵⁵顧德欣、黃琦,〈國家實力的特色、評估與運用〉,《戰略與管理》(北京:中國戰略與管理協會),頁57至65;黃碩鳳,《綜合國力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頁46;丁永康,〈九〇年代澳洲基廷政府與霍華德政府對國家利益觀點之比較分析〉,《問題與研究》(台北:政大國際關係中心,民國87年7月第37卷第7期),頁65-70。

⁵⁶張文木,〈中國國家安全哲學〉,《戰略與管理》(北京:中國戰略與管理協會,2000年第1期),頁24-32。

⁵⁷楚樹龍,〈中國的國家利益、國家力量和國家戰略〉,《戰略與管理》(北京:中國戰略與管理協會,1999年第4期),頁13-18。

係密切，所以「國家利益」的次序「發展利益」、「主權利益」、「生存利益」，終期成爲國際體系的具關鍵性的重要成員。⁵⁸ 趙曉春、戴超武等指道，國家利益涵蓋國家生存和發展的利益，冷戰後各國經濟相互依賴，跨國境的全球性問題日益突出，基於國家利益考量，各國在對外政策及國際政治運作上。⁵⁹ 郝雨凡、張燕東表謂，當前的「國家利益」在致力於國家現代化，基於經濟全球化與民族矛盾日益凸顯的情形下，首要之務在積極與美國接觸，俾營造外部和平的國際新秩序，促進發展與進步。⁶⁰

「國家利益」是現實主義的核心概念，與權力政治、國家安全互爲表裡，爲因應國際政治的複雜變遷，呈現出政治、經濟、軍事、安全等不同面向的理性思考，基於外交是內政的延長，中共迄今並未與美國一般，對國家利益予以規範；基此，筆者認同國家生存是國家利益的不變基本原則，在對中共的國家利益進行探討時，應注重其核心價值的長久利益，及以國家政策爲目標的長、中、短期利益才是，其餘的各種經濟、安全等利益僅是手段與策略運用而已。

二、國際體系變遷下的大國興衰

國際政治關係的動觀瞻動向，向來係由「大國」所宰制，美國耶魯大學教授甘乃迪（Paul Kennedy）依據各種經濟數據統計後表述，近代國際體系中的大國與強權崛起，與政治經濟制度並無直接關聯，卻與經濟、科技的發展後的總體經濟實力、生產力，具有因果關係，衍生出經濟、科技及軍備的實力，將影響各國國力之強弱，乃至國際體系中強權的更替與否。⁶¹ 胡鞍鋼分析，中共經濟發展已進入起飛階段，至二〇二〇年將成爲世界經濟強國，更是近百多年以來，繼美、日之後的世界性大國，從而或將改變世界格局。⁶²

劉靖華、王在邦指出，大國或強權的崛起與衰落，都與國家政策、社會變遷有直接關係，進而促使國家發展凝聚動力，影響對外關係；國家衰落的肇因，不外乎是外部力量或內部腐化造成，今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且國力逐漸強大時，應促

⁵⁸王逸舟，《國家利益再思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 版），頁 160-170。

⁵⁹趙曉春，〈論冷戰後國家利益的新變化〉，《國際關係學院學報》（北京：1995 年 1 月），頁 1-7；戴超武，〈國家利益概念的變化及其對國家安全和外交決策的影響〉，《世界經濟與政治》2000 年第 12 期（北京），頁 11 至 16。

⁶⁰郝雨凡、張燕東，〈限制性接觸—美國新政府對華政策透視〉，《戰略與管理》2001 年第 4 期（北京：中國戰略與管理協會），頁 41。

⁶¹張春柏等譯，Paul Kennedy 著，《霸權興衰史》（台北：五南圖書公司，民國 90 年版）。

⁶²胡鞍鋼，《挑戰中國》（台北：新新聞出版社，1995 年版），頁 7-20。

使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為宜，而非成為國際關係得麻煩製造者。⁶³ 程廣中以地緣戰略及歐洲國際政治歷史角度論及，近代以來的瀕海強權國家，因善於利用時機乘機崛起，再配合正確的戰略及對內、對外政策，方成為海上強權國家。⁶⁴ 倪峰強調，從地緣政治角度觀之，美國雖為海上強權國家，但對東亞大陸的掌控能力有其侷限性，為維持東亞地區的秩序，遂運用加強同盟、強化軍事優勢及積極介入東亞地區事務等，作為基本政策之工具。⁶⁵

郭學堂指稱，世界經濟對國際政治週期並無影響，冷戰後的國際體系朝多極化發展，國際社會呈現高度相互依存狀態，所以「霸權週期理論」的分析方法已不再適用。⁶⁶ 楊成認為，國際體系中的霸權是不平等的權力結構分配，雖然常藉提供公共財以居中獲取超額利益，但面對權力之爭，係在比較優勢，所以霸權為維持自身利益，經常放棄自身主導的國際體系。⁶⁷

毛思迪（Steven W. Mosher）主張，中共精英份子至今仍崇尚以大陸為中心的世界觀，目前與其他國家的夥伴關係等外交作為，僅是圍地謀和的外交策略及實施手段，最終將藉由主權、周邊安全等作為，建構區域霸權及全球霸權。⁶⁸ 布里辛斯基更明確指出，冷戰後關於中共將崛起成為全球大國之說，基於現實層面的評估，現階段僅能在區域稱雄而已。⁶⁹ 美國國防部於二〇〇二年七月發表的《中國軍力年度報告》和美國國會美中安全評估委員會的《美中經濟關係對國家經濟安全的影響》報告，都認為中國的崛起威脅美國的國家利益，並威脅亞太和世界安全。

董立文表示，中共不斷強調以「綜合國力」作為國力衡量及國家競爭的基準，實與「霸權理論」互為表裡，若將鄧小平的對外政策視為「和平外交」，鄧後的全球戰略上則呈現「爭霸外交」趨勢。⁷⁰ 余起芬指出，「大國」除需具備構成

⁶³劉靖華，〈霸權的興衰與其理論啟示〉，《戰略與管理》（北京：中國戰略與管理協會，1999年，頁49-59；王在邦，〈世界領導者地位交替的歷史反思〉，《戰略與管理》1995年第13期（北京：中國戰略與管理協會），頁1-5。

⁶⁴程廣中，〈瀕海強國參與國際政治的世紀性規律〉，《戰略與管理》1999年（北京：中國戰略與管理協會），頁61-63。

⁶⁵倪峰，〈霸權穩定模式與東亞地區政治安全秩序〉，《當代亞太》（北京，2002年7月），頁10-17。

⁶⁶郭學堂，〈國際政治週期性規律中的新問題和新思路〉，《戰略與管理》1997年第1期（北京：中國戰略與管理協會），頁26-31。

⁶⁷楊成，〈國際秩序的三大選擇與國際制度理論－在霸權和均勢之後〉，《社會科學》（上海，2002年9月），頁30-34。

⁶⁸李威儀譯，毛思迪（Steven W. Mosher）著，《中國新霸權》（台北：立緒文化公司，民國90年版）。

⁶⁹林添貴譯，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大棋盤》（台北：立緒文化公司，民國87年版）。

⁷⁰董立文，〈中共的全球戰略與「中國威脅論」〉，《中國大陸研究》第39卷第9期（台北：政大國際關係中心，民國85年9月），頁2827-46。

的基本要素外，彼此間不乏絕對競爭、相對合作及維持戰略均衡等態勢，尤其是冷戰後的多極化大國關係，更是朝向相互制衡發展。⁷¹

國際體系之結構係由國家所組成，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安全困境」格局，權力的大小、運用及行使，已是國家生存及國家安全的保障，而國力則是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表徵，不論是在崛起或是霸權的大國，都具備優勢的經濟、科技、軍事之實力，基於冷戰後的國際呈現相互依存的現象，崛起的大國不必然會是霸權國家，但只要國際關係崇尚權力政治不變，或以如同列寧時期遂行「和平共處」政策，爭取蘇聯在國際生存空間一般，中共改以「和平崛起」反制「中國威脅論」，但是權力主宰國際政治運作的本質並因此而未改變。

三、一超多強下的大國外交

國家是國際社會中遂行外交政策的主體或是主動者，雖然《聯合國憲章》規範各國的主權平等，但各國在國際體系中，常因幅員大小、人口多寡、經濟、科技及軍事實力而有所區分。黃鳳碩、高恒主張以「綜合國力」結合具體量化之數據，以衡量國家強弱大小，並主張美國為全面性的超級大國，俄羅斯、德國、日本為多面性的大國，中國為奮起直追的大國。⁷² 張登及認為，中共的「大國」概念，已從冷戰前的地大人多，在國際關係中無指涉能力的大國，轉為具國際政治居中協商之權力「大國」。⁷³

中國現代史專家章百家指出：「改變自己是中國力量的主要來源，改變自己也是中國影響世界的主要方式」。⁷⁴ 李五一表示，後冷戰時期及廿一世紀初的國際體系，仍係由美、俄、歐、日、中等大國在主導；故中共應積極與大國、週邊國家及國家集團建立夥伴關係，使國際格局朝多極化發展，俾增強國際影響力。⁷⁵ 李登科指出，中共的「大國外交」始於「十四大」，盛於「十五大」後，「夥伴外交」即為具體策略，至於目的在企圖破解西方國家的預防性遏制，以及防止

⁷¹余起芬，《國際戰略論》（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頁233-267。

⁷²黃鳳碩，《綜合國力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綜合國力新論：兼論新中國綜合國力》（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高恒主編，《2020大國戰略》（大陸：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⁷³張登及，《冷戰後中共「大國外交」之研究》，民國91年7月，頁49-50。

⁷⁴章百家，《環球時報》，2000年2月18日，轉引自時殷弘、宋德興，〈21世紀前期中國國際態度、外交哲學和根本利益戰略思考〉，《戰略與管理》2001年第1期（北京：中國戰略與管理協會），頁18。

⁷⁵李五一等著，《大國關係與未來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2002年版）。

大國支持台獨的勢力。⁷⁶ 我外交部出版刊物《外交年鑑》即表達，中共外交並非只重視大國而忽視小國，至於推動「大國外交」旨在建立各種不同夥伴關係，從事「周邊外交」與鄰近國家交往，無非是企圖營造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孤立。⁷⁷

喻西來、吳紫辰指出，中國基於綜合國力的提升，雖已是新興的大國，但惟有融入國際體系中，才是生存之道，惟應在符合中國的國情下，結合國際體系的多極化與全球一體化之理想，塑造中國成為建設世界新秩序的負責任大國、東亞地區的領頭羊，積極建立集體安全模式。⁷⁸ 時殷弘、宋德興認為，中國應抓住歷史的機遇及契機，躋身世界強國之列，綜論應以「搭便車」⁷⁹ 不依附其他國家，或是避免安全困境而採行「超越」政策，作為世紀性的對外戰略，意即「對外政策第一」(the primary of foreign policy)原則。⁸⁰ 李少軍指稱，後冷戰時期，世界主要大國對國際體系間的關係或多或少有歧見，但都具有通過漸進的方式改變國際體系之政治共識，藉以減少戰爭及對抗，凸顯出協商與合作之作爲，將是今後大國間互動關係的主要趨勢。⁸¹ 唐世平表謂，中國的國際地位在冷戰後已扶搖直上，對於國際安全問題應擔負起責任，惟如何成為「負責任大國」，應積極擘建全球性經濟利益的存在，全力維護區域性安全具舉足輕重的地位，積極爭取參與國際事務的發言權。⁸²

學者張睿壯指道，外交政策受到國際體系架構的制約，所謂「和平與發展」與「多極化世界論」、「中美戰略夥伴關係論」，都是誤判國際形勢，若再主張「合作精神」，不顧慮戰爭危機和霸權威脅，終將會面臨殘酷及無情的國際現實面。⁸³ 張蘊嶺指出，廿世紀以來的英、美、德、日、法、中、俄等大國崛起與發展過程

⁷⁶李登科，〈冷戰後中共大國外交策略之研究〉，《政大外交所國際關係學報》第15期（台北：政大外交系，民國89年2月），頁33-68。

⁷⁷《中華民國83年外交年鑑》，頁705、706；《中華民國86年外交年鑑》，頁781；《中華民國87年外交年鑑》，頁587；《中華民國88年外交年鑑》，頁681；《中華民國90年外交年鑑》，頁615。

⁷⁸喻西來、吳紫辰，〈世界新秩序與新興大國的歷史抉擇〉，《戰略與管理》（北京：中國戰略與管理協會，1998年第1期），頁1-12。

⁷⁹便車不等於依附，而是指順應世界潮流，堅持既定的改革開放政策，廣泛參與國際體制和遵從國際規範，儘速學習先進技術、管理方式、思想文化和國際行爲等與國際接軌之方式。

⁸⁰時殷弘、宋德興，〈21世紀前期中國國際態度、外交哲學和根本利益戰略思考〉，《戰略與管理》2001年第1期（北京：中國戰略與管理協會），頁10-19。

⁸¹李少軍，〈世紀之交大國關係的特點，21世紀：世界格局與大國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⁸²唐世平，〈再論中國的大戰略〉，《戰略與管理》2001年第4期（北京：中國戰略與管理協會），頁29-37。

⁸³張睿壯，〈重估中國外交所處之國際環境—和平與發展並非當代世界主題〉，《戰略與管理》2001年第1期（北京：中國戰略與管理協會），頁20至30。

中，實力消長是大國關係構成和變動的基礎，利益原則是對大國對外關係的根本，意識型態則為大國關係往來的準繩；另大國的行為、發展及結構，都影響著地區及世界的脈動。⁸⁴

「大國」主導國際政治，一直是國際社會的現實寫照，但是冷戰後的國際格局出現以和平為主導的國際政治趨勢，是以「大國」呈現「一超多強」格局，在外交運作上以多極化的面向呈現，再者大國之間藉由對談合作取代抗爭，以獲取國家最大的利益，惟因國家實力的消長，使得大國的權力政治，在區域間出現重新組合與排列，進而對區域安全再次造成衝擊。

四、和平共處的夥伴關係

傳統的國際關係中，「聯盟」是國與國之間為增加國家安全及權力的政策工具。⁸⁵ 關中認為，「聯盟」傳統特性係旨在軍事合作、以權力平衡為工具，自核武發展後完全以政治為目的及考量，演變成各國基於各自利益，而維持某種共同利益，如冷戰期間美、蘇兩國即為「敵對夥伴」(adversary partners)，美國與盟國之間則為「友誼競爭」(friendly competitors) 關係。⁸⁶ 張也白指出，為避免現存大國與崛起大國之間的衝突，後冷戰時期所建構的「夥伴關係」，是種互不敵對、互不對抗的關係；容忍彼此在價值觀的差異，避免以己之利益挑戰及損害別人的根本利益，倡議的是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關係，不存在以誰為主導。金熙德認為，冷戰後「夥伴關係」是雙邊夥伴關係，替代敵對與同盟的關係，具備「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的共同特徵，並以合作及對等為政策內涵。⁸⁷

陳潔華表示，中共因應後冷戰的世界格局變化，建構「戰略合作」、「全面合作」、「睦鄰友好」及「為友好與發展的友好合作」等四種類型夥伴關係，並以此「戰略外交」作為改善及調整，中共與大國及與週邊國家的關係。⁸⁸ 劉文秀強調，中共建立「全面夥伴關係」僅是「戰略協作關係」而非聯盟關係，俾利於中國在國際地位及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然在合作的背後，不可忽略其他非傳統安

⁸⁴張蘊領主編，《夥伴還是對手—調整中的中美日俄關係》(百年大國關係的軌跡)(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頁9至23。

⁸⁵于有慧，〈中共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持續與轉變〉，《中國大陸研究》第43卷第6期(台北：政大國際關係中心，民國89年6月)，頁13。

⁸⁶關中，《國際關係理論簡介》(台北：民主文教基金會，民國81年版)，頁155-162。

⁸⁷同註84，(張也白，中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確立與前景，頁93；金熙德，中日夥伴關係的確立和未來發展，頁211)。

⁸⁸陳潔華，《廿一世紀中國外交戰略》(北京：時事出版社，2001年版)。

全觀的問題。⁸⁹

郇慶治、王珂說明，大國之間的戰略或全面合作夥伴關係，可以力量對比均衡、戰略利益諧和、經濟利益互補及政治文化相近等四種因素，作為界定雙方關係及衡量未來的發展前景，若純以力量對比及戰略利益的因素，可顯現出多極化格局趨勢，以及利於國際新秩序的合作。⁹⁰ 李寶俊、劉江永表示，後冷戰時期，中國藉由「夥伴戰略」走出去，開展以亞太地區為重點的全方位外交，建構權力平衡、多極化體系及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另「夥伴關係」，予人中國外交政策或將朝向法理主義，甚或是從衝突走向協調的現實主義。⁹¹ 學者丁奎松指出，中共雖然建構「夥伴關係」，但在信心及安全機制方面卻未獲得鞏固，反使「夥伴關係」有遭到異化之虞。⁹²

于有慧簡析，中共分與美、歐、俄、日等大國建立夥伴關係，旨在藉由外交策略以追求影響國際體系的權力、藉經濟發展後追求國家整體財富以顯經濟實力，凸顯國際地位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⁹³ 邱坤玄陳述，中共面對大國權力的重新排列組合趨勢，若與其他國家建立夥伴關係，不僅可以發展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合作關係，且在不涉及雙方的核心國家利益下，並從根本上消除對中國安全的威脅，更可在此外交戰略原則下，促成多極化世界格局。⁹⁴ 許志嘉指稱，「夥伴關係」式的外交政策，旨在推動大國或周邊重要國家的關係，企圖藉由條約化的約束雙方之間的友好關係，消弭「中國威脅論」，進而確保追求經濟發展與現代化建設所需的國際和平環境。⁹⁵

「夥伴關係」是冷戰後的主要大國間外交策略聯盟的新型態，旨在建構權力

⁸⁹劉文秀，〈中國—歐盟「全面夥伴關係」的內涵與定位〉（大陸：山東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2年2月版），頁68至73

⁹⁰郇慶治、王珂，〈全面合作夥伴關係：從比較的觀點看〉，《現代國際關係》（北京），2002年5月，頁53至57

⁹¹李寶俊，〈冷戰後中國外交新戰略與中西關係的走向〉，《邁向21世紀的中國外交》（香港：天地圖書公司）；李景治編，〈世紀之交的中國與世界—國際政治論文集〉（李寶俊，從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看中國外交理念的變化）（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頁72-73；劉永江，〈國際關係夥伴極其面臨的挑戰〉，《現代國際關係》（北京），1999年第4期，頁2-3，轉引自周煦，新世紀的中美關係，國際關係學報（台北），政大外交學系出版，民89年12月，頁71。

⁹²丁奎松，〈亞太大國關係對地區安全合作的影響〉，《現代國際關係》（北京），2001年1-2期，2001年2月，頁88。

⁹³于有慧，〈中共的大國外交〉，《中國大陸研究》第42卷3期（台北：政大國際關係中心，民國88年3月）。

⁹⁴邱坤玄，〈結構現實主義與中共大國外交格局〉，《東亞季刊》第30卷第3期（台北：政治大學東亞所，民國88年夏季刊），頁27-29。

⁹⁵許志嘉，〈後鄧小平時期中共外交政策的持續與轉變〉，《國際關係學報》第15期（台北：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民國89年12月），頁121-150。

平衡，在維護國家利益的同時，亦能顧及各大國間的共同利益，由於中國大陸接壤國界眾多，在「引進來」全力發展經濟後，現更強調建立「夥伴關係」適度「走出去」，不僅消除「中國威脅論」且進一步促成「多極化」格局，另在世界朝和平發展的格局下，筆者嘗試以「新安全觀」的平等、協作、互利、互信之核心價值，解讀中共推動「夥伴關係」之因果關係。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中共在「十四大」確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鄧小平思想後，又適逢冷戰後的歷史機遇期，隨即又因經濟發展突飛猛進，綜合國力遽增，世界銀行更以平均購買力價格，預期中國大陸之經濟實力，將於廿一世紀中期可追趕上美國，屆時恐將成爲美國霸權的惟一挑戰者。基此，本論文將對冷戰後中共一系列的外交作爲進行分析探討，時間從冷戰結束的一九九〇年前後作爲起始點，但論述重點置於一九九七年以後迄今，並以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及「反霸」、「反恐」及對外政策作爲，尤其是如何形成「大國外交」、「夥伴關係」及與主要大國間的國際政治互動上，作爲檢證的主軸。

其中有關大國外交及夥伴關係形成部分，將依據領導人、國家及國際社會體系三個層次進行分析，並以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之動向，以及中共黨政官方文件，探述如何在「和平與發展」及「國家利益」的架構下，以鄧小平的廿八字外交方針，實踐「遠交近親」的大國外交及夥伴關係，進而凸顯「中國」在國際格局中的大國地位。另在面對「一超多強」的國際格局，如何藉由「權力平衡」營造多極化的國際格局，並凸顯與美、俄、歐、日等大國之間，如何在顧及自身的國家利益與國家安全時，利用「機遇與挑戰」時機伺機以和平方式崛起，進而可能對亞太區域及台海之安全造成何種的影響。

二、研究限制

（一）研究主題限制

本文旨在探討中共「十五大」後，在中共領導人、國家利益的主導下，「大國外交」政策形成，建立「夥伴關係」的實踐過程，以及兩者之間的互動與因果關係；惟因國際政治關係錯綜複雜，無法巨細靡遺，僅嘗試從中共與美、俄、英、法、德、日等大國之間，已為事實且具有衝突性、爭議性之外交事件，進行指標性的探討，以深入瞭解中共對外關係。

（二）資料蒐集限制

- 1、中共及共產國家向來強調外交是種與軍事不同的作戰工作，⁹⁶ 有關國家利益及具體的外交政策向為黑箱作業，且極少進行公開說明及進行討論，因此在相關資料蒐集僅能就所中共發行的政府公報、智庫期刊及學者專書論述，予以窺知，惟在中共決策過程等有關客觀性因素，難窺全貌，實待進一步查證。
- 2、本文對美、俄、英、法、德、日等國之政情瞭解不夠深入，筆者又侷限外文能力有限，在資料蒐集方面難免掛一漏萬，以致影響研究之宏觀性與整體性，尤在兩岸問題分析處理上，恐涉入民族情感以致過份主觀，恐有以偏概全之虞。

第六節 章節安排

本文共計五章，各章節內容分述如下：

第一章 緒論

說明本文的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理論、文獻回顧、研究範圍與限制、分析架構及章節安排等。

第二章 中共大國外交與夥伴關係形成

本章將探討中共依據鄧小平的國際政治思想，在後冷戰期間制訂相關外交政策，倡議發展成多極化的國際格局下的獨立自主大國，以遂行權力平衡；再基於國家利益，主張國際新秩序下的「大國外交」，倡議「新安全觀」俾建立夥伴關係，以反遏制「中國威脅論」。

第三章 中共與美國的夥伴關係

本章將探討中共與美國在冷戰後的外交策略變革，尤其是在美國的霸權外交下，

⁹⁶錢剛鐔，《中共外交政策與策略》（台北：黎明文化公司，民國72年版），頁10。

中共與柯林頓及小布希政府如何藉元首及政治、經濟、軍事高層領導的互動，在外交領域從事交往，並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然基於國家利益又進行反恐合作與反霸競爭。

第四章 中共與其他大國的夥伴關係

本章將探討後冷戰期間，中共在國家利益及國家安全的考量下，先與俄羅斯修補交惡已久的兩國關係後，再建立「友好合作」及「戰略性協作夥伴」關係。基於「遠交近親」的外交策略，更與歐盟、英、法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與德國保持經濟互動的具全球責任的夥伴關係；另與經濟大國日本，在經濟合作上保持良好互動，並建立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

第五章 結論

本章將探討中共在與強權大國建構夥伴關係後，能否塑造國際新秩序的國際政治外部格局，尤在「大國外交」的運作下，對亞太及台海安全的影響。並評估中共的外交策略可能發展，以及研究成果與啓示。

本論文章節安排如下：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 第二節 研究目的
- 第三節 研究理論
- 第四節 文獻回顧
-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 第六節 章節安排

第二章 中共大國外交與夥伴關係形成

- 第一節 中共領導人對國際格局之認知
- 第二節 中共新安全觀與國家利益
- 第三節 夥伴關係與大國外交
- 第四節 夥伴關係與建構國際新秩序
- 第五節 小結

第三章 中共與美國的夥伴關係

- 第一節 中美互動下的外交基本策略

- 第二節 中美建構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
- 第三節 夥伴策略下既聯合又鬥爭之關係
- 第四節 中共反霸與美國反恐之策略對峙關係
- 第五節 小結

第四章 中共與其他大國的夥伴關係

- 第一節 中共與俄羅斯的夥伴關係
- 第二節 中共與歐盟的夥伴關係
- 第三節 中共與日本的夥伴關係
- 第四節 小結

第五章 結論

- 第一節 夥伴關係對國際秩序的影響
- 第二節 大國外交對亞太安全的影響
- 第三節 小結